



溯源甘肃

通渭寿名书院

本报特约撰稿人 陈胤儒

沿革与建制

通渭地区的书院教育历史悠久,其作为陇中文化重镇,依托区域士绅阶层的积极推动,开启了本地系统化教育的新阶段。书院教育在清代经历显著发展,成为地方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。清代统治者推行“崇儒重道”的文教政策,进一步刺激了民间书院教育的普及与发展。通渭书院的兴起既顺应了国家层面的教育导向,亦契合地方社会对知识传播与人才选拔的实际需求。因此在通渭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四大书院,分别是近圣书院、华川书院、华阳书院、寿名书院。

清乾隆五十五年(1790年),通渭县知县冷文炜带头捐资,改县城文昌宫为近圣书院。对考入书院的生员,要求“能学有本原,不专以记诵词章为务”……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知县吕鉴煌在近圣书院废墟上又倡建了寿名书院。

吕鉴煌,字海珊,粤东鹤山人,曾任甘肃平襄知县、甘肃靖远知县。有《竹林词钞》《金霞仙馆词钞》,是寿名书院的倡建者与《寿名书院碑》的撰文者。作《南柯子·木棉》,此词以浓墨重彩,点染出木棉的异态奇姿。收处蒿然仁者之言,与杜甫“大庇天下寒士”之志略同。词作内容如下:“绡絮翻飞乱,胭脂渲染工。烛龙十丈跃晴空,记得越王台畔树灯红。火伞撑天阔,霞标插地红。四围青绉透寒风,安得苍生衣被万家同。”由此可见他教育思路的形成,是将政治实践与文化理想相交织,其对教育的重视与地方民众对文化的需求不谋而合。

吕鉴煌对寿名书院的贡献,首先体现在书院构建上。其对书院的选址及建筑规模做出了主要规划。“当时吕鉴煌等捐钱修建的建筑有:大门3楹,西向北为守院所房舍3间,东为重门,门内为南北斋房各7楹,厨房2楹,讲堂7楹,南、北书房各3楹,上建文昌殿7楹,北为主讲所,书房3间,厨房3间。”

其次体现在教育理念中。从《寿名书院碑》内容来看,其提出“金石土木之寿以形,人之寿以名”的指导思想,倡导当地民众前来求学,并要求学习者应勤学苦练,摒弃愚昧思想,向“完人”的目标而不断要求自己。这种“以育才为己任”的教育理念使得“百年后诸君之名亦可以寿矣”的思想得以被当地民众广泛接受,深远影响着当地后续百年的教育思想及发展轨迹。

寿名书院在教学制度设计层面,实行“讲会制度”与“山长负责制”,“讲会制度”是中国

书院的基本教学组织形式。书院讲席者主要由当地著名的文人宿儒或德高望重的退隐官宦担任,分为每日讲、隔日讲或朔望讲等日程安排。“会”指“会课”,书院师生定期集会,研习经典、交流心得,传阅所作的课艺。山长负责制是一种确立山长为书院领导核心的管理模式,清代书院的山长或掌教,多为前任或现任官员,他们一般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,从官场中退下之后,经地方官介绍,担任某一书院山长。因此清代书院山长的选任和以往朝代不同,不仅要德才兼备,还要具有较高的学识和良好的品德,山长为书院的一院之长,起模范作用,主持教务,取舍诸生,是书院的核心。自书院制度确立时,人们就特别重视山长一职,山长的学术水平及德行高低甚至可以决定书院的兴衰。寿名书院通过官员倡捐、文人捐赠、乡民投工等几种形式保障经费来源,确保教育活动的持续性,同时还非常注重教育质量与人才培养,既满足了民众子女学习的需求,也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,这些举措使寿名书院迅速成为陇中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之一,也是通渭文化教育的象征性存在。

金石载文

《寿名书院碑》完整留存了寿名书院创办之初的办学初心与教化理念,是承载书院教育思想的重要实物佐证。

(一) 碑刻基本情况

寿名书院碑,清同治十三年(1874年)立,现存通渭县文庙小学,为石灰岩质,浅褐色,高1.46米,宽67厘米,厚11厘米。碑楣呈半圆形,篆刻一“寿”字。碑文竖刻楷书7行,系知县吕鉴煌撰文。

(二) 碑文原文

人寿乎?土木寿乎?金石寿乎?必曰:金石寿矣,其次土木,其次人。虽然,金石土木之寿以形,人之寿以名。名之寿,寿于金石土木,而并能寿金石土木者也。是故,寿莫寿于人。煌摄平襄,日以育才为己任。都人士果,学优品粹,勉为完人,百年后诸君之名亦可寿矣。为我告邑人曰:今兹书院落成,若来路是院,险是堂者,毋徒聘宏郎而恬幽雅也,当求其所以寿者。

同治十三年口月署通渭县 大挑知县 粤东吕鉴煌

(三) 碑文释文与教育内涵

是人活得长久呢?还是土木长久呢?还是金石长久呢?一定是:金石存在最长久,其次是土木,其次是人。虽然这样,金石土木是通过形体长久的,人是通过名声长久的,名声的长久比金石土木更长久,而且能与金石土木一起长久下去。因此,没有什么比人的名声更长久的。吕鉴煌代理平襄知县,每日以培养人才为己任。城中读书人果真能学习优秀品行拔萃,勉励自己成为完美之人,百年之后各位的名声也可以长久留传。为此我告诫县里人:今日这书院已落成,如果想置身书院求学,就不能只羡慕高官子弟而安心于自己的愚昧幼稚,应当探求他们名声长久的原因。

碑文凝练阐释书院育人宗旨,鲜明提出学优品粹,勉为完人的教育追求,确立立德修身、育才留名的办学方向,集中体现寿名书院立德树人、崇文育人的核心理念。

(四) 书法价值

书院作为士人文化的核心空间,是学术研究的场所。《寿名书院碑》作为通渭地区重要的清代书院碑刻之一,其书法艺术价值在碑刻文本中得以集中体现。该碑竖刻楷书7行,以中锋行笔为主导,笔画工整匀称,字形方正端庄,章法布局严谨有序,既体现了对唐代楷书法度的继承,又融入了清代“馆阁体”书风的独特韵味。“馆阁”的功能类似于“皇家图书馆”。到了唐朝,“馆阁”成为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场所。北宋称为“三馆”,还承担图书编纂工作。明清时

期,馆阁的职掌归于翰林院。明永乐时,翰林院侍讲学士沈度,其书法风格秀润华美,正雅圆融,深受明成祖朱棣赏识,因而名重朝野,士子争相仿效,遂成标准书体。明代之后,与这种风格一致的书风被称为“台阁体”,清代称为“馆阁体”,该书风以乌黑、方正、光洁、等大为特点,掌握馆阁体也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要能力。其工整划一的视觉效果,符合官方文书的权威性要求,亦与书院碑刻承载的教化功能相契合。

从字形特征来看,碑中书体以方正匀称的造型为基底,通篇线条干净劲挺,可见书丹时墨色浓重且光洁如漆,展现出典型的“乌黑”“光洁”的审美特质。笔画起笔处多以方切为主,收笔处虽兼具藏锋与露锋,但露锋多用于“撇、捺、勾”等笔画处,且并不尖刻,既保持了力度的内蕴,又通过变化形成丰富的节奏感;大部分线条粗细趋于均等,却在一些以“长横”作为主笔的字中仍可见“两头粗中间细”的提按关系,使线条呈现出刚柔相济的特质;转折处方圆结合,形成秀美端庄的视觉效果,这种笔法的运用,既符合“馆阁体”规范化的书写要求,又在严谨中透出灵动,构建出庄重典雅而富有张力的艺术风貌,使整幅作品呈现出庙堂之气与文人意趣的和谐统一。这种标准化的字形限制了书风的统一性,深刻反映出官方书体追求制度规范的核心诉求。

在章法布局层面,碑中文字符合“馆阁体”“整齐划一”的创作理念,以严谨的行列间距构建秩序感,字距与行距均保持适度的空白留驻,形成“横成列、竖成行”的矩阵式布局。这种规整的排列方式并非机械复制,而是在统一中寻求变化,如单字内部的微调与整体行气的流畅相协调,使庄严的法度规范与书法艺术的灵动性达成统一。文字线条与结构的稳定运作,使通篇文字在视觉上呈现浑然一体的崇高感,既符合科举应试中对书写规范的要求,亦彰显出官方书体所承载的文化权威。这种章法设计通过空间秩序的精密调控,最终塑造出既符合实用需求又具备审美价值的书法范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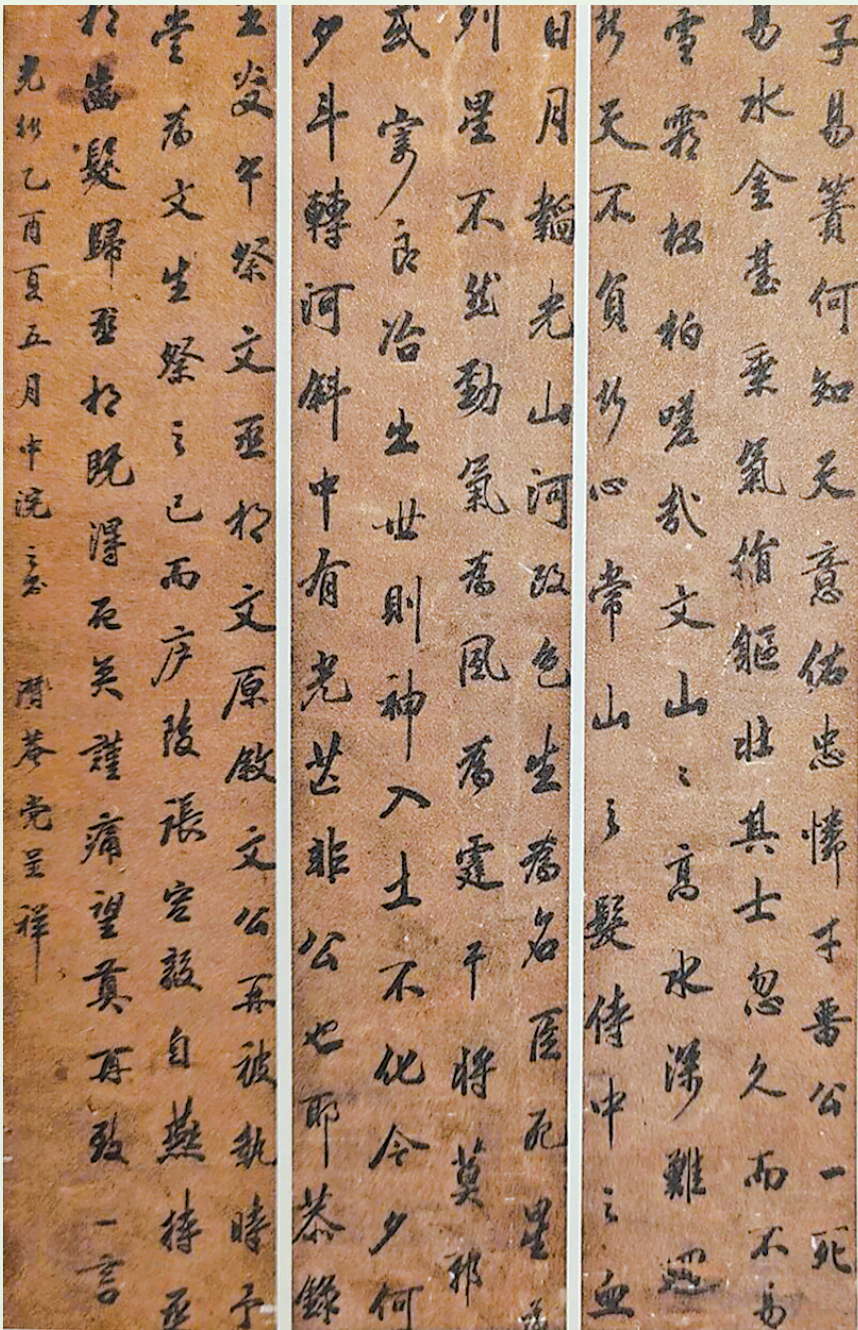
“馆阁体”在该碑中的应用,体现了书院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地方书法艺术的深度联系,同时折射出中央集权体制下对文化统一性的强化需求,反映了清代的文化特征。作为科举考试的法定书体,其规范化书写要求与儒家思想中“中庸”的核心理念相契合。碑文中通过工整匀称的字形与规整的行间距布局呈现出“学优品粹,勉为完人”的教育理念,实现了文字内容与书写形式的双重教化功能。同时,“馆阁体”追求“乌黑、方正、光洁、等大”的书写标准,为书写规范的普及与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,推动了汉字书写体系的规范化进程。

文脉赓续

寿名书院作为通渭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,其确立的“学优品粹”教育理念深刻塑造了通渭地方教育的实践路径。该学训以“学优”为学术追求,要求学子精研六艺、勤修经史,同时以“品粹”为道德准则,强调立身修德、践行仁义。这种双重价值导向通过书院的日常教学、考课制度及师生互动,系统性地渗透到通渭士子的文化基因中。

(一) “耕读传家”理念的深化

通渭农业历史悠久,人们在土地上耕作生产,不仅创造了丰富的农耕技术,还衍生和发展出传承不息的农耕文化,成为通渭的文化底色。碑文中“学优品粹”的传统不仅规范了士子的个人修养,更影响了通渭社会的整体风气,许多人家的大门上都镌刻着“耕读第”的字样,正是书院精神在民间社会的生动投射。通过书院的影响力,不断推动“耕读传



寿名书院主讲之一,党呈祥书法作品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家”理念渗透到百姓的社会生活中,这种文化传统使人们既重视农业生产,又追求知识修养,形成了“耕可养身,读可明道”的社会共识。

在这里,许多家族将耕读写入家训,如牛作麟所作《牛氏家言》中提出“古人为学重实行,今人为学重文辞。须知重实行者,不妨文辞。不但不妨,而且益茂。重文辞者,无益实行。不但无益,亦必反损”的思想,与书院学训一脉相承。寿名书院倡导将学术追求与修身立德相结合,书院师生在研习经典的同时,也参与农事劳动,体会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处不易”的道理。这种教育模式影响了人们勤劳节俭、尊师重教的品格,使耕读文化成为家庭传习的核心价值观念。

(二) “中国书法之乡”的产生

通渭地区“中国书法之乡”称号的取得,与书院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化塑造的结果密切相关。书院作为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,通过系统化、多元化的实践路径,不仅推动了书法艺术在区域内的传承与发展,更在深层次上塑造并强化了通渭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质。

有学者提出了造就通渭“中国书法之乡”称号的因素:第一,地域因素。通渭身处丝绸之路,书法艺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通渭地区,被当地人所接受;第二,教育因素。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机构培养了通渭崇尚传统书画艺术的传统,培养建立当地百姓的审美意识。

书院所传递出的学习氛围推动了通渭书法的浓厚氛围。从清代通渭知县冷文炜的草书流派,到近现代安任山、冯寿延等书画名家的涌现,再到当代书法家的坚守,书院传承的人文精神激励着一代代

通渭人以笔墨为伴,将书法融入日常生活。

(三) 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

书院所承载的教育体系在提升区域文化、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其通过系统化的教学模式与严谨的学术训导,构建了完整的文化传承网络。书院不仅注重学术培养,更强调经世致用,这种教育理念直接催生了通渭地区科举取士人数的显著增长。书院对通渭教育的深层影响,还体现在其构建了可持续的文教传承机制,为科举仕途输送了稳定的人才梯队,同时推动了民间私塾、义学的蓬勃发展,形成了官学与民间教育相辅相成的教育网络,使通渭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水平。

书院人才的涌现不仅局限于科举功名,更在区域社会发展层面产生深远影响。这些受过系统教育的士绅阶层,最终成为地方治理与文化振兴的关键力量。他们在主持书院的同时,推动乡约制度的完善,编纂地方志书,形成了“以文化人”的良性循环。这种学术氛围的营造,使通渭地区在明清时期涌现出以党呈祥、卢敏为代表的一批饱学之士,其著作如《六经臆解》《通渭县志》等,均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。

书院教育的辐射效应进一步提升了通渭的文化声望。随着书院培养人才在科举、学术、政务领域的持续突破,通渭逐渐形成“西北文化重镇”的区域形象。这种文化资本的积累,吸引周边地区学子前来求学,形成了跨区域的学术交流网络。书院通过知识传授、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播的多重作用,最终塑造了兼具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文化教育生态体系,其影响至今仍能在通渭的文脉传承中找到深刻印记。



寿名书院碑